

“伟大胜利在江南”

——抗日战争时期的九里镇战斗

■张磊 易青豫

1938年,新四军第1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展开作战,他们认真贯彻中共中央“发展华中”的方针,在敌人后主动出击,有力打击了该地区的日军。1939年11月8日至9日,新四军第1支队在江苏丹阳九里镇一带与“扫荡”的日军展开激战,取得毙敌中队长以下168人、俘3人的重大胜利,被称为“延陵大捷”。九里镇战斗(亦称贺甲战斗)的胜利,打破了日军的“扫荡”计划,创下新四军在江南开敌的新纪录,提高了新四军的威望,极大振奋了江南军民抗战热情。当时上海和江南等地报纸纷纷以“伟大胜利在江南”为标题作了报道,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。

结合实际,决心主动出击歼敌

1939年10月下旬,新四军第1支队新6团在镇句、镇丹开展破路行动后,当地日军曾两次下乡搜寻,均被新6团及丹阳独立支队予以痛击。日军不甘失败,继续寻找新四军主力,企图通过“扫荡”歼灭新四军有生力量。

11月7日,日军第15师团池田联队1个中队从镇江西南宝堰出发,向丹阳县延陵、九里镇地区进犯。为打破日军“扫荡”计划,第1支队决定在丹阳独立支队配合下,主动出击歼灭日军,其原因有二:一方面,日军刚在杨柳铺取得战果,态度十分傲慢,我军主动出击有利于调转日军,援助友军;另一方面,日军此次出击,意在寻找新四军目标、侦察虚实,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,由于新四军第1支队部署在日军侧翼,敌人所到之处均未发现新四军踪迹,第1支队可乘敌不备,采取急袭,打击日军。

随后,第1支队召开营级干部会,阐释此次战斗的意义和争取胜利的条件,并要求全体政工人员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动员群众协助作战,这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设伏打击,与日军激战九里镇

11月8日晨,当折返九里镇之数十名日军行至贺甲村附近时,遭到丹阳独立支队设伏打击,当场被毙伤10余人。日军随即占据附近小高地进行顽抗,与丹阳独立支队形成僵持状态。得到情报



位于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的贺甲战斗纪念馆。资料照片

的新6团团长段焕竞,率第1、第3营前来增援。在猛烈攻势下,日军从小高地向九里镇西北贺甲村退却,我第1营则乘势追击。与此同时,第3营一部从日军左翼进至贺甲村正面小桥,与第1营共同对敌展开攻势。

穷途末路的日军,随即向新四军施放毒气,导致不少官兵中毒。日军趁机以机枪猛烈扫射,造成部分人员伤亡且进攻严重受阻。考虑到周边敌援军可能快速赶到,段焕竞致函第2团团长王必成,请求支援以全歼该股日军。

二团驰援,迫敌撤退固守待援

接到来函后,王必成令第2营掩护电台,自己率第1营、第3营前往贺甲村增援。其中,第1营由王家村出发,经堰坡桥、张庄一线,于午后到达贺甲村西北,第3营则进至南、北雨庄附近。此外,丹阳独立支队一部也在副支队长林胜国带领下,转移至贺甲村附近。随后,王必成、段焕竞与林胜国商议,认为退至

贺甲村的日军不到百人,当前我军兵力占据完全优势,可将敌一举歼灭。于是,他们进行了战斗部署:第2团第3营以1个连向村北端进攻,第1营以1个连向村西北端进攻,另1个连向宝堰方向警戒,阻敌增援;新6团第1营向村南端进攻,第3营于九里镇向直溪、珥陵方向警戒,阻敌增援;丹阳独立支队向丹阳、白兔等地警戒,阻敌增援。该部署同时确定当天14时由3股兵力同时发起攻击,力争在敌增援未到之前解决战斗。

14时许,新四军各部对贺甲村之敌展开进攻。第2团第3营强攻村北端一座木桥时,遭敌逆袭,被阻于木桥北侧。第1营从村西北端进攻,因地形开阔,不得不在敌火力下运动,遭敌火力压制,攻击受阻。新6团第1营也因村南端地形开阔遭敌火力覆盖,攻击受阻。加之天降大雨,又有消息称有日军从白兔前来增援。对此,王必成转而采取“围点打援”策略,下令各部队暂停进攻,撤出战斗以应对敌援军。但增援日军因雨势太大,害怕途中被伏击而原路撤回,我军“围点打援”计划未能实现。此时,贺甲

村之日军占据村南端的大祠堂作为指挥部,准备固守待援。

二次围攻,敌情变化进攻受挫

在对大祠堂内日军数量、伤亡情况及轻重武器配置进行评估后,第2团、新6团和独立支队认为,我军应充分利用当夜大雨的有利条件,在拂晓前完成战斗部署,迅速歼灭据守大祠堂之敌。为增加我军有生力量,扩大战果,第2团立即调第2营前来增援,并负责主攻任务。其他部队的部署计划包括:新6团负责延陵方向警戒,钳制村东南端之敌;第2团第3营进攻村北端,第1营进攻村西端。

9日拂晓,进攻正式开始。第2营4连先以1个排的兵力在村中摸排前进,接近大祠堂时,突遭隐蔽于草堆中的日军袭击,双方随即展开白刃战。由于敌众我寡,我军被迫后撤。4连即以全部兵力发起冲锋。一部日军在我军火力压制下渐显不支,被迫退守大祠堂继续顽抗。与此同时,利用雨夜潜入贺甲村增援的日军140余人,与原被困村中的数十名日军分散在村子各方向,同我第2团各部展开激烈战斗,我军在村西、北两个方向的进攻进展缓慢,战斗陷入胶着。但此次围攻,村中日军已死伤众多,成为瓮中之鳖。

第三次总攻,全歼突围残余日军

10时许,经过简单的动员部署,第2团、新6团、丹阳独立支队集中兵力发起第三次总攻。不到两小时,我军便攻下村大祠堂外日军各部的全部阵地,村中残余日军被压缩至大祠堂内。为尽快解决战斗,防止日军死守待援,第1支队采取“围三缺一”的战法,即命令在村北端进攻的第3营故意放开一个口子,让敌人突围,主力则埋伏在敌人逃跑必经道路两侧。

据大祠堂负隅顽抗的日军因弹尽粮绝,增援无望,冲出大祠堂,企图向殷家、江口方向突围,遭到我第2团第3营的伏击。战至中午,逃跑的这股残余日军全部被歼。战斗至此胜利结束。

史说新语



商朝青铜胄。资料照片



秦朝石胄。资料照片



西汉时期铁胄。资料照片

边关秋月照兜鍪

——中国古代卫体兵器之胄(上篇)

■曹波

甲胄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防御类兵器。在梳理完中国古代甲胄中“甲”的演变脉络后,本期我们将目光转向其不可或缺的配套装备——“胄”。

胄是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颈的装具,因时代不同又被称为“兜鍪”“头盔”“盔”等。现代研究中,胄和这些别称没有绝对的区分,本文采用的是文献记载中的习惯性称谓。

胄的形制多样,有带垂缘、能够提供更全面保护的胄型,也有只提供简单保护而无垂缘的胄型。我们所熟知的典型的胄,一般由保护脑部的胄体和保护颊、颈、喉的各型覆甲垂缘构成。垂缘一般为胄体下坠保护物的统称,保护颈部的垂缘也称“顿项”,但垂缘、护颈、顿项在很多文献中无绝对的区分,我们也将采用习惯性称谓。

早在新石器时期,就已出现藤胄、皮胄。进入青铜时代,古人除继续使用皮胄外,开始使用铜铸造的胄,还使用以皮革为主、重要部位用青铜加固的皮铜复合胄。我国发现最早的铜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商朝青铜胄。这些铜胄为整体浇铸成形,重2至3公斤,高约15厘米,底宽约18厘米,其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,正面大多铸有浮雕型兽面纹饰,兽目和兽眉在鼻上向左右伸展,兽嘴部位则露出将士的面部,胄的顶部有一竖起的铜管,用以安插缨饰。西周时期的铜胄也是整体浇铸,但在造型上摒弃了商朝的华丽纹饰,总体更加朴实。

春秋战国时期,皮胄、铜胄仍被使用,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皮胄,由18片漆涂皮甲片编缀而成,顶部有一

纵向胄脊,下有护颈。随着铁兵器的发展,铁制的护首装具在战国时期已有出现。由于其外形似釜(古代的一种锅),也被称作“兜鍪”。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时期铁兜鍪,由7层89片铁甲片组成,甲片开孔以绳线串联编缀而成,能将整个头部裹护严实,样式简单、工艺单一却实用,这种编缀甲片的方式也被称为札甲式。

秦汉时期开始,铁兜鍪逐渐取代铜胄,成为军队的主要护首装备。目前已发现的,多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石兜鍪。这些石兜鍪与当时秦军使用的铁兜鍪形制一样,由数十块石甲片以铜条编缀而成,样式与燕下都出土的铁兜鍪相近,但垂缘略长,可披搭于肩,防护性更强。秦陵出土的这些兜鍪为石质,这是因为石材不易腐朽,能够长期保存,更适合用来制作陪葬品。

汉朝时期,铁胄开始大规模配发军队,其基本形制沿袭了秦朝胄。比如,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铁胄,与秦胄形制相近,即以简易札甲方式,用若干方形或者接近于方形的铁甲片编缀而成,采用的也是除露露于外的全包式结构。为使胄佩戴起来更舒适、更美观且适应不同战场需求,汉朝对胄的甲片大小、形状、弧度进行改进,并提高胄的札甲工艺。西安北郊汉墓出土的铁胄采用缩小甲片并加工成弧形的工艺,同时通过甲片层层压叠、紧

密排列方式,展现出高超的札甲制作技术。这种工艺不仅使胄的整体弧度更加流畅自然,还显著提升了佩戴舒适性。西汉齐王墓出土的札甲式无顶铁胄,胄体前高后低,两侧有护耳,显现出轻便透气的特性,适用于炎热气候使用。吉林老河深村出土的铁胄,更像是无顶铁胄的升级版,其胄体上半部分札甲片呈长条形并以半球形圆铁顶收拢甲片,使胄体整体较高,可在战斗中减少兵器砍入胄体后直接伤及头部的伤害,颈后札甲延伸至枕骨下与护耳处平齐,加强了对颈部的防护。此外,这种高顶铁胄的形制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更普及,其制作方法直到唐宋时期仍在使用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,甲胄的防护性能日益受到重视。这一时期将东汉末年出现的“百炼钢”技术进一步改进,并运用于甲胄制作,使甲胄的质量大幅提升。此外,为提高防护效果,军中将士常以铁胄和金领及铠甲配合使用,使防护死角越来越少,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具装骑兵的出现。这一时期胄的形制多承袭东汉,但也不乏工艺、形制方面的创新。比如,南北朝时期出现以若干大甲片拼接为半球形胄体,顶部由小半球形铁甲顶收拢,下半部分再坠锁子甲等各型垂缘的制胄方式。这种工艺让胄显得更简洁美观,且方便在胄体上刻制花纹,对后世胄影响深远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

链接历史

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的苍翠群山中,坐落着一处被历史铭记的小村落——植地庄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,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——广州市区游击队第2支队的重要活动区域。游击队员们曾在这里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、智勇双全的英雄壮歌。

1944年7月23日,广州市区游击队第2支队新编第2大队250余名战士,在大队长卫国尧带领下,秘密前往位于市桥的日军据点,准备发起突袭。可惜天公不作美,台风忽然裹挟着暴雨席卷而来,洪水瞬间淹没了行军道路。

为保存实力,卫国尧果断决定撤回植地庄隐蔽待机。游击队刚住下,部队的行踪便被潜伏在植地庄的特务获悉,即向驻市桥日军报告。

7月26日凌晨,日军独立步兵第8旅团500余人,趁着夜深人静,兵分两路分别从石岗岗、市桥向植地庄扑来,计划包抄围歼我新编第2大队。

此时,植地庄一位深夜外出的村民,在半路上发现了敌情。他来不及多想,掉头就往村里跑,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新编第2大队的哨兵。

眼见形势危急,哨兵果断向天鸣枪示警。尖锐的枪声瞬间唤醒了村民和新编第2大队的指战员。然而,快速行进的日军已对植地庄形成包围之势。

千钧一发之际,卫国尧当机立断下达突围命令,并迅速部署战斗任务:主力部队和村民由他亲自率领,边打边伺机突围;副大队长卢德耀带领1个班,抢占村后山头大岗高地,占据有利地形;教导员李海率领一部负责殿后。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中队长何达生肩上——率领植枝、黄贤、黎明、孔联、曾九、陈耀祥、梁细九等7名战士留守植地庄,利用地形与敌周旋,以牵制敌军主力,掩护大部队转移。

晨曦微露时,装备精良的日军已占领植地庄外围高地,随即向村内发起猛烈攻击。炮声振聋发聩,枪声密集如雨,嘶喊声在村庄上空回荡。

在民兵协助下,留在村内的何达生8人小分队争分夺秒地展开行动。他们一方面将村子的闸门堵死,依托围墙构筑起坚固掩体,同时大造声势,让敌人误认为我军主力尚在村内;另一方面,将20余名未能及时转移的村民集中到村东头的植氏宗祠里进行掩蔽,保障其安全。

面对强敌,何达生临危不乱,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,敏锐分析地形:村东面,大池塘是一道天然屏障,日军难以逾越;村西面,茂密的竹林里杂草丛生,并有围墙防护,日军也难以入村;村北面,在一个小池塘阻隔下,仅有一条狭窄道路勉强通行,日军只能分兵突进,相对容易防守;村南面,地势开阔,防守难度大,应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方向。于是,他果断地将8人分成南北两路:4名战士携带1挺轻机枪坚守村北面,自己率领3人扼守南面,全力将敌人挡在村外。

果不其然,日军在一番狂轰滥炸后,便从南北两面同时开始进攻。何达生带领战士们奋勇抵抗,凭借着灵活战术,一次次击退进犯之敌。久攻不下,日军改从西面破竹翻墙,一边地毯式搜索,一边焚烧民房。何达生立即指挥大家锁上村中巷道闸门,将寡人之敌困于巷中。战士们利用门楼、小围墙、窗户、墙角等有利地形,躲在暗处持续射击,打得敌军误以为中了埋伏,纷纷仓皇逃窜。

随后,当日军转至植氏宗祠方向进攻时,何达生又早已料敌在先。他

植地庄八勇士智战日军

■汤炎忠

迅速将兵力集中起来,在植氏宗祠严阵以待。日军从东山上用迫击炮朝宗祠方向猛烈轰击,由于距离较远,再加上有宗祠门前的老榕树掩护,大部分炮弹均未击中宗祠。炮声停歇后,敌人以为宗祠已被炸平,便摸索上前,结果刚一冒头,就被何达生和战士们当作靶子狠狠打击。

吃了亏的日军立即停止进攻,选择继续用迫击炮进行轰炸。这一轮轰炸,足足持续了10多分钟,导致宗祠前面的土墙和闸门均被炸塌,百年老榕树也被炸得枝干尽断。尽管如此,战士们依旧毫不犹豫地爬到屋顶继续作战。每当敌人发起地面进攻时,等待他们的总是精准的子弹和从天而降的手榴弹。

激烈的战斗持续至黄昏,当夕阳的余晖渐渐隐去,何达生8人小分队又一次击退日军进攻。此时,他们的手榴弹已全部用完,机枪和步枪的子弹所剩无几,但大家没有丝毫退缩之意。他们默默备好砖块,擦亮刺刀,准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。伤亡惨重的日军眼见夜幕降临又久攻难胜,无心恋战,最终在暮色中选择撤退。

在惊心动魄的战斗中,我军共击毙伤日军70余人,大队长卫国尧等48人在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。何达生8人小分队以超凡的勇气和智慧,成功牵制数十倍于己的敌军,掩护主力转移,被誉为“植地庄战斗八勇士”。

如今,在植地庄外的挹沙岗上,常青的松柏簇拥着一座巍然矗立的巨大石碑——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。碑后,长眠着在植地庄抗日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。“植地庄战斗八勇士”用热血铸就的传奇,成为岭南大地永远炽热的记忆。



广州市区游击队第2支队驻地旧址(植氏宗祠)。资料照片